



# 苏辙“超然”与“快哉”的文化背景与创作关联

##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re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Zhe's "Transcendence" and "Happiness"

周芷嫣

CHAU ZHI YEN

20ALB05116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4





# 苏辙“超然”与“快哉”的文化背景与创作关联

##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re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Zhe' s “Transcendence” and “Happiness”

周芷嫣

**CHAU ZHI YEN**

**20ALB05116**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4**

# 目次

|                            |     |
|----------------------------|-----|
| 宣誓.....                    | ii  |
| 摘要.....                    | iii |
| 致谢.....                    | iv  |
| 第一章 绪论.....                | 1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              | 3   |
|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 5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难题.....           | 8   |
| 第二章 苏辙之“超然”及其与齐州的文化关联..... | 11  |
| 第一节 跳脱束缚的“超然”.....         | 12  |
| 第二节 “超然”与齐州文化.....         | 16  |
| 第三章 苏辙之“快哉”及其与筠州的文化关联..... | 20  |
| 第一节 自适其乐“快哉”.....          | 21  |
| 第二节 “快哉”与筠州文化.....         | 25  |
| 第四章 “超然”与“快哉”的创作关联.....    | 28  |
| 第一节 苏辙的“超然”与“快哉”思想.....    | 29  |
| 第二节 引苏轼两者思想作比较.....        | 31  |
| 结语.....                    | 35  |
| 参考文献.....                  | 37  |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Chau*

---

姓名：周芷嫣 CHAU ZHI YEN

学号：20ALB05116

日期：2024 年 9 月 6 日

论文题目：苏辙“超然”与“快哉”的文化背景与创作关联

学生姓名：周芷嫣

指导老师：余曆雄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苏辙与苏轼两兄弟年龄相仿，两人虽性格不同，但关系非常亲密，对彼此又有着欣赏的态度，因而在哲学和文艺思想上往往相互借鉴，互相渗透。既然如此，在以其中一方作为切入点时，总是避不开对方。当我们同时对两者的一个共同关切去进行探究时，又会发现更为完整和充分的证据和结论。苏辙和苏轼的思想当中皆有提及“超然”和“快哉”。对于苏辙而言，分别发展于其贬谪在齐和筠州时期，期间经历了“乌台诗案”，同样的是仕途走下坡，不同的是前者仍属于自愿，而后者却是戴罪之身。苏辙虽然在被贬筠州后有过三年的郁郁寡欢，却也很快地振作起来，心态又恢复到了从前的“善处乎祸福之间”。乌台一事之前，他称兄长苏轼“超然”，自己亦欣赏这种观点，两人虽对此思想有着同中有异的理解，却同样在往后的坎坷之中以不被外物所连累的想法自我调试，在不同的处境之中感受“快哉”。

**【关键词】** 苏辙、齐州、筠州、超然、快哉

## 致谢

一路走来颇有感慨，呈交论文的时刻便是离开大学的时候，终究要开启新旅程。

愿所有在我生命中路过的人，皆平安顺遂。

仅此感谢所有老师、父母和朋友。

感恩。

## 第一章 绪论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眉山（四川）人，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逝于宋徽宗政和二年，享年七十四岁。<sup>1</sup>苏辙与其父洵、兄轼合称“三苏”；<sup>2</sup>晚年定居颍川，自号颍滨遗老；因曾封栾城县开国伯，故又称栾城先生，亦有自编文集《栾城集》。<sup>3</sup>苏辙一生的学识，受父兄影响很深，但自持特点，其中最见功力的便是政论和史论，写得最自由的则是书信杂文，而他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其中就包括了〈黄州快哉亭记〉、〈武昌九曲亭记〉和〈东轩记〉等。<sup>4</sup>

苏辙的记叙文常借事明理以抒怀，将事与理紧密结合，使其浑然天成，笔法灵动。<sup>5</sup>可以说，若要研究苏辙的文学和思想成就，对其文的探析可谓是必不可少的。其兄苏轼对苏辙文有很高的评价，即“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又说“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sup>6</sup>“汪洋”就是宽广无边的水面，表示苏辙文章义理深广，气势雄厚，而“淡泊”指的是恬淡朴实、通达放旷。<sup>7</sup>何况，他既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史上便颇具分量，是北宋中后期的重要文人，又以文章策论

---

<sup>1</sup>[宋]孙汝听编撰，〈苏颍滨年表〉，王水照点校，《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北京：中华书局，2015），页73。

<sup>2</sup>孔凡礼，《三苏年谱（第二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页54；《三苏年谱（第四册）》，页3155。

<sup>3</sup>李回（分卷）主编，《唐宋八大家广选·新注·集评（苏辙卷）》，页1。

<sup>4</sup>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513-517。

<sup>5</sup>刘乃昌，〈简评苏辙的文学成就〉，《情缘理趣展妙姿——两宋文学探胜》（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页241。

<sup>6</sup>[宋]苏轼著，张志烈等校注，〈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全集校注·文集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页5322；[宋]苏辙著，〈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集（第三册）》，页1127。

<sup>7</sup>崔际银，《唐宋八大家新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页203。



见长。他的现存作品包括《栞城集》《春秋集传》《老子解》《论语拾遗》以及《颖滨遗老传》等。截止目前为止，收录苏辙较为全面和完整的作品集有中华书局于1990年出版的《苏辙集》（全四册）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栞城集》（全三册）。<sup>8</sup>

古代文人以仕途为重，然而年少入仕的苏氏兄弟的宦宦生涯却多有波折坎坷，受党争影响很深，到了晚年也依旧受到打压。在《苏轼评传》中，王水照和朱刚就将苏轼的一生概括成“在朝——外任——贬居”的两次大循环。<sup>9</sup>在兄弟二人关系肝胆相照，政治、人生观点一致的情况下，两者可谓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或可借鉴王、朱之看法，将苏辙的生平也划分成两大循环。更进一步聚焦，苏辙的“超然”和“快哉”思想就恰恰处于第一次循环中“外任——贬居”的阶段，前者属于出于自主，后者却是被迫。

熙宁年间，宋神宗继位，颇想有所作为，于是开始器重主张革新的王安石。然而新派与苏氏兄弟等一众旧党在改革上提倡的立足点和举措有所出入，于是双方产生了矛盾，很快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在这种情形之下，包括欧阳修、张方平和苏氏二人等人皆处于不得志，或外任，或致仕。<sup>10</sup>两人虽已远离朝政中心，在心态上颇有“超然物外”的感悟，但新旧党之争还在蔓延。到了元丰二年（1079），

---

<sup>8</sup> [宋]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栞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sup>9</sup>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45；如果要以一个确切的年代来切割开两个循环的话，便是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高氏太后垂帘听政之际。她对“新法”无甚好感，一执政就着手废除“新法”，不久便恢复苏轼乌台前的官阶。（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页100。）

<sup>10</sup> 李回（分卷）主编，《唐宋八大家广选·新注·集评（苏辙卷）》，页6-7。

苏轼在湖州被捕后，便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sup>11</sup>，苏辙亦连带被谪监筠州（江西高安）盐酒税。<sup>12</sup>经此性命攸关一事，苏氏两兄弟却没有一蹶不振，终日哀怨，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另一番豁达。

## 第一节 研究动机

虽然苏辙受到的关注并不如其他唐宋八大家，如苏轼或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但这并不表示他的作品并不值得研究，反而意味着在他身上有着更大的研究空间。在提及“三苏”时，更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到苏轼身上，这是因着苏轼在文学创造的造诣确实非常高，遗留下来的作品数量也庞大。不可否认的是，学者们在研究苏轼时往往也免不了需要从苏辙的作品中侧面下手。

其实，苏氏兄弟自小一起长大，休戚与共，在《宋史》中就提及：“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sup>13</sup>。苏氏兄弟年仅差三岁，又同期入朝为官，政治生涯起伏基本重叠，可以说苏辙的生平梗概乃至思想抱负，皆与苏轼相似，苏辙自己也说“惟我与兄，出处昔同”<sup>14</sup>。不仅如此，苏氏兄弟间经常有书信往来，更常彼此唱和诗往返，可见得两人文学作品的联系是很深的，以至于彼此的哲学思想互相渗透也就不出奇了。例如，熙宁八年（1075），

---

<sup>11</sup> 《汉书·朱博传》：“御史府……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简体字本二十四史：汉书（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2332。}

<sup>12</sup> 孔凡礼，《三苏年谱（第二册）》，页1146,1167；据说苏轼被捕之时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宋]孔平仲著，〈孔氏谈苑·苏轼以吟诗下吏（卷一）〉，新文丰出版公司编，《丛书集成新编（第八十六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页634。}

<sup>13</sup> [元]脱脱等撰，《宋史（第三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0837。

<sup>14</sup> [宋]苏辙著，〈再祭亡兄端明文〉，《苏辙集（第一册）》，页1100。

苏辙曾以〈超然台赋〉为苏轼在密州时期游玩之处命名“超然台”，而苏轼亦采纳并写下了〈超然台记〉。至于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则作于元丰六年十一月（1083），彼时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sup>15</sup>已于同年较早时期完成，可知“快哉亭”其实由苏轼命名，而苏辙实际上并未亲眼看见此亭，却能够透过苏轼的作品加以引申出自己的观点。<sup>16</sup>

鉴于苏氏兄弟二人相似经历，他们在各方面所持的观点以及表述经常互相呼应配合，因此不论论述方式上的差异，在主旨和立意上，见于苏轼文的亮点则同样可以从苏辙文中寻得。<sup>17</sup>然昔人对于苏辙的研究，仍留有较多空白。同时，我留意到在这两人的作品之中，皆有提到“超然”和“快哉”，但一般上将“超然”与苏轼对应，而“快哉”与苏辙对应，鲜有学者针对苏辙的两者思想同时做出处理。再者，苏辙一生经历颠簸，必然在某个特定的阶段和地点，产生独特的精神面貌和文学特点，但目前为止结合二者于苏辙当下经历的学者却不多。可知的是苏辙的“超然”和“快哉”分别在“乌台诗案”前与后，而在这两个时期，苏辙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之中。故此我产生了以下疑问，即对苏辙而言，这两者思想有何区别？“乌台诗案”是否对他“超然”的想法有所影响？而苏辙所处环境的差异又如何影响苏辙

---

<sup>15</sup> 孔凡礼，《三苏年谱（第二册）》，页 1410；词中言“知君为我新作”，即表示“快哉亭”的建成应属于〈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完成前不久。苏辙应不曾亲眼见过。

<sup>16</sup> 苏轼元丰二年八月入狱，后被贬黄州，其弟苏辙同年十二月则被贬监筠州盐酒税；隔年五月末，苏辙带着兄长的家小到了黄州，短暂逗留后六月上旬便离开，前往筠州；在写下〈黄州快哉亭记〉时，苏辙该年亦未前往黄州（孔凡礼，《三苏年谱（第二册）》，页 1146-1167；1202-1205；1410-1411。）

<sup>17</sup> 朱刚著，王水照主编，《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页 338。

提出两者思想的方式和内涵？且，同时期处境相似的苏轼思想与苏辙思想的异同又为何？往下，我将会尝试探析。

##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在关于“三苏”的研究中，苏轼往往是被探讨的中心，对苏轼的研究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而对苏洵和苏辙的关注有却不足。<sup>18</sup>孔凡礼亦承认苏辙研究与苏轼研究有很大的落差。<sup>19</sup>以 2006 年至 2007 年为例，个体作家对于苏轼的研究共有 277 篇，而对苏辙的研究则有 7 篇。<sup>20</sup>实际上，苏辙一生的成就很高，加之父兄对其的影响，文学内涵十分深厚，在著述方面的成果数量也很多，因而对苏辙也是十分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往昔亦有学者对他做出研究，往下将简略概述。

关于苏辙生平传记的争议不大，苏辙有《颍滨遗老传》自述生平，同时按照时间顺序所编成的《栾城集》也是佐证他生平事迹的资料，加上孙汝听所作〈苏颍滨年表〉他在《宋史》、《名臣碑传琬琰集》和《东都事略》皆有传记，因此后世多在此基础上进行添补。<sup>21</sup>现如今，关于苏辙的生平，有台湾易苏民《三苏年谱汇证》（1969）、王水照的《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1986）、曾枣庄的《苏辙评传》

<sup>18</sup> 李冬梅，〈苏辙研究综述〉，《许昌师专学报》2002 年第 3 期，页 111。

<sup>19</sup> 孔凡礼于 2001 年出版了《苏辙年谱》，不仅是对苏轼研究的延伸，更是对苏辙研究十分重要。随后，他整合了所作《轼谱》、《辙谱》和《洵谱》，于 2004 年出版了《三苏年谱》，为三苏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孔凡礼，〈谈《苏辙年谱》的编撰和出版〉，《宋代文史论丛》，（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页 606，614。]

<sup>20</sup> 刘学，刘扬忠、王兆鹏主编，〈2006-2007 年宋代文学研究论著的统计分析〉，《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2007）》（武汉：武汉出版社，2009），页 6。

<sup>21</sup> 李冬梅，〈苏辙研究综述〉，页 111。

(1995) 及其与舒大刚合著的《北宋文学家年谱》(1999), 以及孔凡礼的《苏辙年谱》(2001) 和《三苏年谱》(2004) 等。

苏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成就也不错, 拥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思想, 可谓是自成一家, 因此明清两代就有《八先生文集》、《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约选》等, 将苏辙含括在内; 当代学者则张朴民有《唐宋八大家评传》(1974), 陈耀南作《唐宋八大家》(1998), 崔际银著《唐宋八大家新论》(1999) 等。虽说是“八大家”, 但对苏辙研究仅占小部分。<sup>22</sup>当然, 也学者倾向于将苏辙划分至“三苏研究”的范围内, 例如今人曾枣庄的《三苏文艺思想》(1986) 和《三苏研究——曾枣庄文存之一》(1999)、陈雄勋《三苏及其散文之研究》(1991) 和孔凡礼的《宋代文史论丛》(2006) 中的“三苏研究”等皆对苏辙的文艺思想做出些许探讨, 但篇幅往往大大少于苏轼。<sup>23</sup>不过, 也有学者单独对苏辙提出见解, 例如陈正雄就在《苏辙学术思想述评》(2000) 中从苏辙生平、思想渊源、政治、军事、财经和文艺思想几个方面提出系统性分析。<sup>24</sup>同时, 刘乃昌在《简评苏辙的文学成就》(2003) 中认为苏辙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上, 称其评史议政颇有见地, 精当简要; 其记叙文事理一体, 富有艺术魅力; 其诗则不如其兄, 但其中仍不乏洒脱清俊之作。<sup>25</sup>而李天保和苾琮则在《苏辙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2023) 一

---

<sup>22</sup> 以崔际银《唐宋八大家新论》举例, 不同于苏轼单起一章节(《苏轼: 唐宋散文的集大成者》)讨做讨论, 对苏辙的讨论则与王安石、曾巩、苏洵合章, 占其中一小节。(崔际银,《目录》,《唐宋八大家新论》, 页 2。)

<sup>23</sup> 以《宋代文史论丛》举例, 所谓“三苏研究”中, 以苏辙为主要讨论对象的专章, 仅占一篇。

<sup>24</sup> 陈正雄,《苏辙学术思想述评》(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0)。

<sup>25</sup> 刘乃昌,《简评苏辙的文学成就》, 页 239-245。

文中，就文学史、政治史和学术史三个角度，细致探讨了苏辙所具有的讨论价值。

26

在期刊方面，对于苏辙的散文研究也有好几篇，例如沈惠乐的〈苏辙散文简评〉（《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6.1）、王素琴的〈苏辙古文研究〉（国立政治大学，1995年硕士论文）、周楚汉〈“文者气之所形”：苏辙文章论〉（《中国文学研究》，1998.1）以及孙虹的〈论苏辙和他的散文〉（江南学院学报），就主要对苏辙的文学创作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sup>27</sup>不仅如此，吕武志和陈凤秋更在〈从《文心雕龙》“六观”看苏辙的记体散文〉（2012）里以刘勰的“六观”之说细致地鉴赏苏辙记体散文特质，并认同其足以为后世之典范。<sup>28</sup>蒯琼在〈苏辙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及影响〉（2014）就尝试从苏辙在北宋古文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前后人对其的评价两个角度，确认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sup>29</sup>

对于苏辙的“超然”思想，则较少学者提出研究其具体含义，更多是针对他的〈超然台赋并序〉做出赏析和注解，例如牛乐在〈苏辙《超然台赋》赏析〉（1989）中就针对赋的文体和苏辙赋的文风做出赏析。<sup>30</sup>不过，在司聃的〈简论道教对苏辙的影响〉（2015）中则有概括性的解释苏辙对于“超然”的应用是典型的宋代士人陷入仕途困顿的治心良方。<sup>31</sup>至于苏辙的“快哉”思想，较多学者基于他的〈黄州

---

<sup>26</sup> 李天保、蒯琼，〈苏辙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深圳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页131-138。

<sup>27</sup> 李冬梅，〈苏辙研究综述〉，页112-113。

<sup>28</sup> 吕武志、陈凤秋，〈从《文心雕龙》“六观”看苏辙的记体散文〉，《静宜中文学报》2012年第2期，页1-29。

<sup>29</sup> 蒯琼，〈苏辙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及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1期，页31-33。

<sup>30</sup> 牛乐，〈苏辙《超然台赋》赏析〉，《名作赏析》1989年第3期，页53-55。

<sup>31</sup> 司聃，〈简论道教对苏辙的影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页16。

快哉亭记》提出见解以及分析，不过并没有结合苏辙其他文本中可能出现的“快哉”思想做出分析。例如郭英德在〈“快哉”源于“自得”——读苏辙《黄州快哉亭记》随感〉（2021）一文中针对这篇散文的写作背景，叙事方式和典故应用做出了较为仔细的分析，同时也提出了苏辙“自得”之说取自老庄以及禅宗的看法。<sup>32</sup>

也有学者尝试将苏辙与地域文化尝试做结合，例如刘乃昌的〈苏辙的齐鲁情节〉（2001）透过《颍滨遗老传》、济南景区亭台以及苏辙在齐州时期的著作，论证了他的对齐鲁文化的仰慕。<sup>33</sup>还有，乔云峰在〈论苏辙与密州〉（2018）中简略地梳理苏辙与密州的关联，即其对密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两句诗的辩证上，改论文更多的谈论了苏轼来密州的原因和活动轨迹。<sup>34</sup>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难题

综上所述，相比于苏轼，有关于苏辙的研究成果是逊色的。索性苏辙拥有自己汇编的文集《栾城集》，加之后人所编《苏辙集》亦可做为直接参考依据。而要了解苏辙的哲学思想，透过其笔下所思所写，则最为准确。故我将使用前文所提及《苏辙集》（1990）作为探析苏辙思想的原文主要依据，并以《栾城集》（2009）作为辅助版本，完成往下论文。之所以主要采用《苏辙集》，主要因其所收录的苏辙佚文更多，于研究而言更为全面。此外，《苏颍滨年谱》及《三苏年谱》这类可

---

<sup>32</sup> 郭英德，〈“快哉”源于“自得”——读苏辙《黄州快哉亭记》随感〉，《文史知识》2021年第2期，页121-128。

<sup>33</sup> 刘乃昌，〈苏辙的齐鲁情结〉，《东岳论丛》2001年第5期，页112-113。

<sup>34</sup> 乔云峰，〈论苏辙与密州〉，《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五期，页6-13。

靠的史料，亦可供本论文作为文本背景的参考，即透过苏辙当下的遭遇，推测出其提出思想的原因。同时，《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这类汇集前人评注的文集又有助于观点论述的佐证，实乃不可或缺。

至于研究范围，苏辙以文见长，多以议论发表自我内在思想，故此若要探讨其精神思想，则以研究其文更为精确，至于其余文类，特别是其诗作亦可作为辅佐资料。不过苏辙最明确提及“超然”和“快哉”这两题眼的作品便是〈超然台赋并序〉和〈黄州快哉亭记〉，所以我将主要围绕这两篇文本做出分析和引申，并引用其他文本作为佐证。加之先前有言，苏辙“超然”及“快哉”思想的提出，涉及了第一大阶段中的“外任——贬居”时期，而彼时他正分别处在“齐州”和“筠州”。于是我便将主要的文本研究范围缩小至他在这两段时期的创作，并稍微拓展至该时期前后范围内，以窥探不同文化环境对其的影响。<sup>35</sup>与此同时，我将追寻前人评注以做进一步论证，分辨这两者思想本身的共性，接着引出苏轼作为参照，对两人该时期的形而上学稍作总结。

当然，这一段时期仅占苏辙丰富人生中的一小部分，但却是他第一次遭受重大政治挫折关键节点，对其往后的人生哲理走向应当起着很大的关键作用，唯有掌握好该阶段的思想转变，才有助于往后的深入研究。总的来说，本论文将综合“追溯法”和“文史结合”两种研究方法，从苏辙本人的作品的互文性及其仕途经历的角度，联同学者评注，分别探讨苏辙“超然”和“快哉”思想的内核。除此以外，为

---

<sup>35</sup> 即熙宁六年前后至元丰八年前。



了探讨苏辙外任和贬谪时期所在的地域环境以及文化对其提出思想的推动，本论文将会透过梳理当地文化特性，并结合该时期文本做出合理分析。

虽然学者们普片对于苏辙的注意较少，讨论和成果并不充裕，针对其概念的对比也不多，但这却是一个良好的切入点，唯独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全面的分析、追溯以及考证，无奈于部分参考资料搜索不易，加之学士毕业论文的篇幅及准备时间同样不富裕，倘若拥有足够的时间，相信本论文将提出更为详尽的考据成果。

## 第二章 苏辙之“超然”及其与齐州的文化关联

有关于苏辙的“超然”思想，主要从他的〈超然台赋·序〉一文切入，率先辨明该思想的大致面貌。熙宁六年（1073），苏辙被派遣为齐州（山东济南）掌书记。彼时苏轼已在余杭当官三年，为解手足相思之苦，他于是主动“求为东州守”<sup>1</sup>，故在〈密州谢表〉中说到“请郡东方，实欲昆弟之相近”<sup>2</sup>，至于两人实际直到罢任的都未能相会便是后话了。<sup>3</sup>不过，苏轼初上任高密时，旱灾严重，又有盗贼四起，因此颇为繁忙。彼时，因着党争，两人处于外任，远离了中央朝政。然而可以看到的是，苏轼并没有从此自甘堕落，反倒是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安定之后方才修葺废台以游玩览胜。他让苏辙命名的“超然台”原是在密州居所的一座旧台。苏辙以“超然”命名此台，便对于苏轼能够不被外物所累，达到老庄思想中“超然”这种超脱、高层次境界的欣赏。这时候，苏辙已在齐州约莫两年，生活也较为稳定了，更与当地文化产生交融，写下了许多作品。单就他的〈超然台赋〉来说，也不失为一篇内外兼具的佳作，其中不论是文采修饰，或是《离骚》式的上句末尾用“兮”字，皆具有楚辞韵味的艺术特色。<sup>4</sup>

<sup>1</sup> [宋]苏辙著，〈超然台赋·并序〉，《苏辙集（第一册）》，页331。（凡有关此原文皆引自此处，后不赘述。）

<sup>2</sup> [宋]苏轼著，〈密州谢上表〉，《苏轼全集校注·文集》，页2565。

<sup>3</sup> 苏轼在《与李公择十七首》其二曾写：“舍弟在济南，须一往见之，然后赴任。”不过由于清河“冬深即当冻合”，因此作罢。[宋]苏轼著，《苏轼全集校注·文集七》，页5600。}；两地虽隔不远，但密州于京东路而齐州属西路，且二人职务繁忙，故在此期间再未相会。[曾枣庄，《苏辙评传》（台北市：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页106-107。]

<sup>4</sup> 乐牛，〈苏辙《超然台赋》赏析〉，页54。

## 第一节 跳脱束缚的“超然”

首先，我们看看苏辙在〈超然台赋·序〉中提及苏轼初到密州直到修葺超然台的情景：

既得请高密，其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受命之岁，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廩恤饥馑，日不遑给。几年而后少安，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sup>5</sup>

密州这块土地的文化可以与质朴、厚重和务实的特点挂钩，但却有一种缺憾，那就是缺少了一些灵动的色彩还有浪漫。<sup>6</sup>这里与杭州的繁华和风气靡丽有着太大的差异，可想而知对苏轼而言，这其中会有多大的落差，更何况迎接他到来的还是蝗虫、盗贼和饥民。在他的〈零泉记〉中，就有提及“东武滨海多风，而沟渎不留，故率常苦旱”，这苦旱一来导致农业损坏，二来也使自然景色变得逊色。<sup>7</sup>话虽如此，面对这样的困境，苏轼却能够说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的一番言论，要知道高密生活不富裕，还要以菊做食<sup>8</sup>，而苏轼甚至以此为乐，将遇到的事都看为好的，因此也就有了跟友人去游山玩水的心思，曰“乐哉游乎！”<sup>9</sup>

<sup>5</sup> [宋]苏辙著，〈超然台赋·并序〉。

<sup>6</sup> 郑和平著，〈苏轼与密州文化〉，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济南：齐鲁书社，1995），页595。

<sup>7</sup> [宋]苏轼著，〈零泉记〉，《苏轼全集校注·文集二》，页1195。

<sup>8</sup> “日食杞菊”，出自[宋]苏轼著，〈超然台记〉，《苏轼全集校注·文集二》，页1105。（后文凡关于此文者，皆出自此处，不再赘述。）

<sup>9</sup> 同上；〈超然台记〉写于熙宁八年（1075），孔凡礼，《三苏年谱（第二册）》，页847。

接着来厘清苏辙的“超然”，〈超然台赋·序〉下文写：

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嚙于荣辱之海，噤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sup>10</sup>

在苏辙看来，山里的人知山，树林里的人知林，农夫知原野，渔人知水，皆安于自身的处境，却无法体会他处的趣味。他们是自食其力的人，只是长期的劳动却会限制他们的眼界，对生活感到麻木。反之，苏轼所修葺的台能够登高望远，将各处广阔的景象收入眼帘，因此苏辙在赋里说超然台位于“东海之滨，日起所先。岿高台之陵空兮，溢晨景之洁鲜。”<sup>11</sup>此台之高，竟能先于他者受到阳光的爱抚，一个“溢”字又将孤高不胜寒的高台渲染得充满活力。<sup>12</sup>显然，这是一种夸张之词了，不过这种身处于至高超然的地位也就契合了精神上的凌驾于物，故而“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sup>13</sup>由此可知，苏辙的所说的“超然”还包含了“高、远、大”的面貌以及“离尘脱俗”和“高超出众”之意。<sup>14</sup>至于那些士人在是非与荣辱之间奔走，也就陷入挣扎和图囿中，所以都是无法“超然”的存在。

---

<sup>10</sup> [宋]苏辙著，〈超然台赋·序〉。

<sup>11</sup> [宋]苏辙著，〈超然台赋〉。

<sup>12</sup> 乐牛，〈苏辙《超然台记》赏析〉，页 54。

<sup>13</sup> [宋]苏辙著，〈超然台赋〉。

<sup>14</sup> 饶学刚，〈苏东坡在黄州〉（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页 346。

接着苏辙引《老子》中“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二句作为题眼。<sup>15</sup>“荣观”指的是宫阙，代表了荣华和权利；而“燕处”则是一种在闲暇、安静的环境中生活。<sup>16</sup>此处即指虽有至高的权利和无数的金钱，也能处于超然，是一种以静对动（躁动）的概念。简单而言，“超然”的关键在于“静”，即平静的看待外在的事物，不为荣华富贵所动心，由此“不累于物”，甚至超越于物。“静者御物，躁者御于物”<sup>17</sup>，“静”的对立是“躁”，而奔走于世俗名利就是“躁”，就会迷失，因此“静（超然）”才能处于主动。这就如老子所言“道常无为而无所不为”<sup>18</sup>，“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就是一种“无为”。这是因为它将世上所有事物都放到了同一个位置，不分高低贵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去操控；同时，因着心中包含一切，就能“无不为”。

老子的“无为”主张不仅是门政治哲学，更深切地从个体的主观感受去关注人生的自由和安逸，是对于“人”本身的关怀；而庄子更是提出“无为有国者所羁”，认为出仕便会失去自由，因而要“终生不仕”。<sup>19</sup>当然，苏氏兄弟二人尚未去到这一地步，更多是采取“不必仕不必不仕”<sup>20</sup>的随遇而安的超然心态。实际上，这与传统儒士入世精神有关，仕途受挫也成为了他们失意的最大根源。是以，大多谪居文人仍旧期待复仕，但王朝君主却以贬谪作为控制和维护政权的手段，使士大夫们

---

<sup>15</sup>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105。

<sup>16</sup> 孔凡礼，《宋代文史论丛》，页546。

<sup>17</sup> 孔凡礼，《宋代文史论丛》，页546。

<sup>18</sup> 朱谦之，《老子校释》，页146。

<sup>19</sup> [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老子韩非列传》，《史记（下）》（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1705；张海鸥，《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页235-236。

<sup>20</sup> [宋]苏轼著，《灵壁张氏园亭记》，《苏轼全文校注·文集二》，页1162。

在仕途上的调动特别频繁。<sup>21</sup>归根结底，儒士的经世思想、阶级提升的唯一渠道与当官紧密结合、职业选择的受限，加上经济与官职的挂钩，都迫使大部分文人需要走上仕途，于是如何在这种波兰不定寻求思想上的超脱便不出奇。

实际上，从苏辙的角度出发，他提议为台取名“超然”就是一种对苏轼的劝诫和宽慰。两人的性格迥然相反，苏轼锋芒毕露，经常作诗写文含沙射影，暗讽变法革新，也因此在北京中常被针对不下去，只能自请外任；而苏辙则更为谨慎内敛，他明白兄长若持续陷入党争，必然陷入愁苦之中，故此当他发现苏轼能够在政务繁杂之余，还能够处于物外，就更要鼓励他抱持这种“超然”的心态，不为官场纷争所累。

或者说，苏辙的好道也有着天性使然，他在〈和迟天舍杂诗〉中就写：“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州”<sup>22</sup>，因而他会以“超然”作为提议，也就毫无意外。何况，苏辙早年在天庆观北极院的老师，张易简就是一名道士，因此他与道教结缘甚早。<sup>23</sup>他除了研读儒家典籍以外，对道家亦有所涉猎。不过，与苏轼尝读诸多道家典籍的方式不同，苏辙更专注于老庄，因为后世道书也不过是老庄的衍生，一如他在〈和子瞻读道藏〉中说“道书世多有，吾读老与庄”<sup>24</sup>。甚至，从〈超然台赋·序〉中苏辙在反面解释“超然”时引用寓言的方式也与庄子有所相似。

总的来说，苏辙的“超然”是将功名利禄看淡，参破荣辱，试图跳脱于外物，不因身份高低牵动自己的心态，就如“顾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终年。盍求乐于

---

<sup>21</sup> 张海鸥，〈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页 201-202。

<sup>22</sup> [宋]苏辙著，〈和迟天舍杂诗〉，《苏辙集（第三册）》，页 927。

<sup>23</sup> 司聃，〈简论道教对苏辙的影响〉，页 15。

<sup>24</sup> [宋]苏辙著，〈和子瞻读道藏〉，《苏辙集（第一册）》，页 35。

一醉兮，灭膏火之焚煎”。<sup>25</sup>这看起来与儒家积极建立功业的心态其实是有所矛盾的，可是当道家这种无拘的精神萌芽于苏辙作为一名在宦海中漂浮的士大夫而言，又是统一合理的。<sup>26</sup>也可以说，苏辙的“超然”是他在面对逆境的调适成果，即不被贬谪生涯压垮的途径。当他不再被外物牵连心绪，便不因外物所烦闷。

## 第二节 “超然”与齐州文化

古代文人的创作多为有感而发，日常所见所闻往往牵动着作者的内心，进而直接作用在其笔下书写的对象，是以文人在不同环境下的创作颇有出入。举个例子，在苏轼作为杭州通判期间，由于需要巡视各县，故往往能够看到他对山水情景的载述创作像是〈游径山〉等，而苏辙彼时作为陈州一名普通学官，社会接触面则狭窄许多，因此更多是一次韵苏轼诗的方式发挥想象及引发议论，这点在其〈次韵子瞻游径山〉有很好的体现。<sup>27</sup>

话说回来，苏辙辗转诸多州郡，对齐鲁文化有着很浓厚的情缘。<sup>28</sup>这点在他自己就有说“我生本西南，为学慕齐鲁”，可他刚到齐州便遇上旱灾，“谁言到官舍，旱气裂后土”，齐人饥寒交迫，被迫以掠夺作为生存的手段，也让他忧心万分。<sup>29</sup>济南是泉水盛勇之地，“蒲鱼之利与东南比，东方之人多称之”，奈何到了此地，苏辙却见不着甘泉，甚以为“舜其不復享耶！”，直到第三年才终于等来了雨霖，“泉

---

<sup>25</sup> 同上。

<sup>26</sup> 司聃，〈简论道教对苏辙的影响〉，页 16。

<sup>27</sup> 曾枣庄，《苏辙评传》，（台北市：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页 95。

<sup>28</sup> 刘乃昌，〈苏辙的齐鲁情结〉，页 112。

<sup>29</sup> [宋]苏辙著，〈送排保甲陈祐甫〉，《苏辙集（第一册）》，页 87。

始復发”。<sup>30</sup>当苏轼三年后来到了密州，也遇上了相似的情景，更使苏辙有所共情，方以“超然”与苏轼共勉之。

相对于在陈州的封闭和清闲生活，苏辙在齐州则更为忙碌，这与其职务和“济俗”有关。《宋史·官职七》中记载“掌书记”为“幕职官”，需“掌裨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长而罢行之”，也就是说他需要参与各项地方政务。<sup>31</sup>他在〈寄孙朴〉中提到“忆昔补官太皞墟，泮宫萧条人事疏。日高鼾睡声嘘嘘，往还废绝门无车。……官居一去真蘧庐，东来失计悔厥初。夜闻桴鼓惊闾闾，事如牛毛费耘鋤。”<sup>32</sup>就将在陈州的闲空和齐州的繁忙做了一个显著的对比。因此，苏辙出游受限，甚至连齐州附近的东岳泰山也是在上任后一年方才得以登览，即作〈游太山四首〉。在此情况之下，便不难看出他对于苏轼上任密州时的忙碌深有体会，从而有“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sup>33</sup>的感叹。

不过，齐州以山湖泉水著称，其中西湖又建有许多亭台楼榭，故苏辙写了不少有关于此的诗，像是〈和孔教授武仲济南四咏〉<sup>34</sup>和〈舜泉復发〉等。其中，〈槛泉亭〉不仅道出泉水涌流的气派景观，还刻画了鹅鸭和牛羊这等农务景象，不论从视觉意象还是听觉意象，都交织出充满生活情趣的自然风情和生物动态。<sup>35</sup>此外，〈舜泉復发〉则描绘了泉眼干旱后重回澄清，伴着春雷暑雨环绕城地的生机蓬勃景

<sup>30</sup> [宋]苏辙著，〈舜泉诗并序〉，《苏辙集（第一册）》，页 343。

<sup>31</sup> [元]脱脱等撰，《宋史（第十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 3975。

<sup>32</sup> [宋]苏辙著，〈寄孙朴〉，《苏辙集（第一册）》，页 97。

<sup>33</sup> [宋]苏辙著，〈超然台赋·序〉。

<sup>34</sup> 即〈环波亭〉〈北渚亭〉〈鹤山亭〉〈槛泉亭〉。

<sup>35</sup> 刘乃昌，〈苏辙的齐鲁情结〉，页 112。



象，并突出“亭”的孤高。<sup>36</sup>同时，由于临湖鱼产丰富，在其〈西湖二咏·观捕鱼〉<sup>37</sup>中则有渔人捕鱼闲散之景。可以说，他对齐州的喜爱，都投射到了他笔下的世界。

然而正是处于如此平民化的生活中，苏辙却能够看透其中的本质，即“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他并不认为这些身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是真正地感到超脱，因为这些人更多是基于生存所需才“知”，而非发自内心地感到愉快。初来时的干旱令他看见百姓因着失去外物，就“流亡聚”<sup>38</sup>，可见得“物”就是最不可靠的，唯有内心的平静才能对应自然带来的恐惧。

更甚，相对于江和海的汹涌，湖和泉其实显得更为平静，而齐州恰恰便是属于“静”的范畴，故而“静”的“超然”的扎根便是顺其自然了。不可否认，纵然苏辙以“内心”的重要着眼，强调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发生改变，但他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影响。齐州泉眼干旱而后复发，民生得以改善一事，在很大程度上也使他的心情由郁闷转至明朗。

其实，苏辙更想要的事一种无拘无束的平静生活，在他的〈答文与可以六言诗相示因道济南事作十首〉中对其的齐州生活有着比较全面和细致的描写，不论是“钓鱼”还是“舜井”都富有他对此处的怀念和情结，甚至我们还能看出他的一丝无奈和感伤。辗转不如意的仕途使他对于“超然”的“静”有一种向往，与兄长的聚少离多和对家乡的思念，也都让他产生了挣脱官宦场，和兄长一同去归隐的想法。

---

<sup>36</sup> “连山带郭走平川，伏涧潜流发涌泉。……谁家鹅鸭横波去，日暮牛羊饮道边。”出自[宋]苏辙著，〈榭泉亭〉，《苏辙集（第一册）》，页 89；“奕奕清波旧绕城，早来泉眼亦尘生。连宵暑雨源初接，发地春雷夜有声。”出自[宋]苏辙著，〈舜泉复发〉，《苏辙集（第一册）》，页 98。

<sup>37</sup> 另一咏为〈食鸡头〉。

<sup>38</sup> [宋]苏辙著，〈送排保甲陈祐甫〉，《苏辙集（第一册）》，页 87。

<sup>39</sup>熙宁九年，苏辙的〈次韵子瞻寄眉守黎希声〉中“思家松菊荒三径”便是对苏轼〈寄黎眉州〉的“且待渊明赋归去”的回应。<sup>40</sup>这是在尽可能寻求仕途以外的诗意和人生自由，试图用审美的追求来冲淡功名利禄的得失，以一种旷达的精神哲理进行内心世界的超越。<sup>41</sup>

---

<sup>39</sup> 乔云峰，〈论苏辙与密州〉，页 9。

<sup>40</sup> [宋]苏辙著，〈次韵子瞻寄眉守黎希声〉，《苏辙集（第一册）》，页 122；[宋]苏轼著，〈寄黎眉州〉，《苏轼全集校注·诗集二》，页 1393。

<sup>41</sup> 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页 64。

### 第三章 苏辙之“快哉”及其与筠州的文化关联

苏辙的文学理论，想来最看重“养气”说，他认为“气”是作者的精神状态，投入文章中便会以气势呈现出来。<sup>1</sup>诚然，这一点在〈黄州快哉亭记〉有良好地展示。“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至”<sup>2</sup>出自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非常鲜明地指出自己的文风特质。作此文时，苏辙才过了进士，虽尚未经历往后风霜，但其文艺造诣已然很高，而他自己也从来都在文章中彰显出词沛气充的特色。该文提文章的神化之境，虽“不可学”，然以“气”却可达之。<sup>3</sup>这里的“气”乃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sup>4</sup>，即是说只要透过后天的培养，加之阅历的增长，使内心充实、精神饱满，所作所为皆符合道义，自然就“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sup>5</sup>了。

相对于淡然的“超然”思想，“快哉”虽也讲求不为外物所牵制，但更多带着一种肆意，是对“快”的追求。有关于苏辙“快哉”思想有着最明显指向的便是他在筠州期间所作的〈黄州快哉亭记〉（元丰六年），他在其中直接阐述了自己对“快哉”的理解。苏辙写此文的目的表面看是要称赞张梦得的情怀坦然，实则抒发自己的“快哉”观点。显然，文中并未有张本人所言，其“有以过人者”不过是出于苏

<sup>1</sup> 崔际银，《唐宋八大家新论》，页 201。

<sup>2</sup> [宋]苏辙著，〈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集（第二册）》，页 381。

<sup>3</sup> 韩兆琦等，《唐宋八大家命篇赏析》（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页 280。

<sup>4</sup>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杨伯峻译注，〈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 62。]

<sup>5</sup> [宋]苏辙著，〈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集（第二册）》，页 381。

辙的角度提出的，甚至“快哉亭”也不是张命名的。也就是说，究竟张君的快哉为何，并不重要，苏氏兄弟二人不过是在“借题发挥”。

## 第一节 自适其乐“快哉”

以〈黄州快哉亭记〉来看，“快哉”实际上有着内外两层含义。文章之“起”，不先写“亭”，而先写“江”，便是为了点出登亭的快哉之意，让人领略此亭之所以能够“快哉”，皆由江水所托，这是其外。他把长江的磅礴写至极致，因为张梦得谪居此地，建亭便是要“览观江流之胜”，因此建的是亭是台实则并非重点。江景如何切要看观景之人的心态，若是愁苦万分，便也不能领略奔腾流水的气势，这是其内。

“快哉”的浅层含义，是由快哉亭内往外看到的景色带来的“快”。是以苏辙在论述“快哉”之时，先写的是跨越时间的天地景象，以亭为宏观空间的起始，四方辽阔无阻，江涛和风雨交相涌动。此为建亭后，亭中所见。为了加强“快哉亭”之所以不同，苏辙以建亭前后所视，做个对比。此前白昼与黑夜景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迅速变化着，所见所闻皆惊心动魄，不可久视。然此番胜景如今却可在“快哉亭”内得以尽收眼底，一个“玩”字凸显了亭中之人的快哉。此为世人皆能感受的快乐，故为“快哉”之一。又或者，我们可以将亭看做痛苦到快哉的“转折点”，因着张梦得找到了在贬谪处境下调适自我的方法，才会选择建造亭，也因此才会为江景所感到快乐，而这也是苏辙“快哉”的内核，即“自适其乐”。

接着视角一定，聚焦人间生活，望向西边诸山，山峦起伏，时间缓慢下来，随着日出雾散，显露出乡野农舍，就使江起云涌的气势得以放缓，带出安逸宁静的氛围。然这“快哉”之二，说的非渔人樵夫之乐，而是失意士大夫才能体会的快乐。一如苏辙所言：“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sup>6</sup> 以上两层是相对的写实，即眼前所能见的景象，但这“快哉”之三写的却是“心中所思古迹”<sup>7</sup>，即历史的联想，同时此处“故城之墟”更是与上段“赤壁”<sup>8</sup>全开之势相做连接。此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sup>9</sup>的“流风遗迹”是古事为今用，是虚中有实。其中的“快”是世俗和士大夫皆能够感受的，但实际却是不同的。

以上三个“快哉”之间有所差异，但其实本质上却是相同，都是源自于外部的因素刺激而来的“快”。可见，苏辙先以此层层剖析，往下再加强“快哉”之内核。他并非否认外物所能带来的“快”，但是更认同内心之于外物的作用。因此，他便“节外生枝”，引宋玉《风赋》<sup>10</sup>，是为道明“快哉”二字出处，并加以评论分辩己之“快哉”与宋之“快哉”的区别。宋玉认为“快”与“不快”和“遇”与“不遇”是相连的，人若“遇”才能“快”，“不遇”就“不快”。<sup>11</sup>他以风之雌雄来讽刺，是说明人间的不平等，王侯与庶民都是世人，但生来却不平等，际遇也不同，

---

<sup>6</sup> [宋]苏辙著，〈黄州快哉亭记〉，《苏辙集（第一册）》，页331-332。（有关此原文皆以此作为依据，后不赘述。）

<sup>7</sup> 陈耀南，《古文今读》，页310。

<sup>8</sup>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孙、刘大败曹操于（湖北武昌）赤壁山，而苏轼到黄州见（湖北黄冈）江滨有山形如赤壁，便以假乱真作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念如娇》。[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页6628。]

<sup>9</sup> [宋]苏轼著，〈念如娇·赤壁怀古〉，《苏轼全集校注·词集一》，页391。

<sup>10</sup> 宋玉《风赋》亦点出了风的客观性，即“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楚]宋玉著，〈风赋〉，吴广平编辑，《宋玉集》（长沙：岳麓书社，2001），页44。]

<sup>11</sup> 郭英德，〈“快哉”源于“自得”——读苏辙《黄州快哉亭记》随感〉，页124。

相同的事（风），对楚襄王而言是快乐的，但对于平民来讲却不是。就如同舟上的人悠然自得，但划船的却辛劳憔悴。<sup>12</sup>同理，风原是客观的存在，并无雌雄之别，有别的其实是人的“遇”。这是宋玉的《风赋》所言，但苏氏兄弟实则并不采用这个观点。就如同在《水调歌头》中，苏轼便直指“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sup>13</sup>认为宋玉不解“风”之无所“托”，正是因其心中“有恃”。<sup>14</sup>相较于苏轼的直接，苏辙较为委婉，采用娓娓道来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

故此他进一步阐明了人之不同，并非因着“遇”，而是“其中”的缘故。对其而言，人的“快”应当超越“遇”和“物”的限制，否则便会被外物所“伤性”。简而言之，他认为人的心态是“快哉”与否的关键：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sup>15</sup>

以上所说的道理其实并不艰深，不过是在论述人的内心即“其中”对人的影响。一个人的心中假如总是不自得，那哪怕是身处高位，衣食无忧，也总会郁郁寡欢，

<sup>12</sup> 刘松涛，吕晴飞主编，《黄州快哉亭记》，《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页1500。

<sup>13</sup> 庄子《齐物论》中将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和“天籁”三种，只有“天籁”不为外物所累。{[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页45。}；[宋]苏轼著，《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苏轼全集校注·词集一》，页431。

<sup>14</sup> 郭英德，《“快哉”源于“自得”——读苏辙《黄州快哉亭记》随感》，页124。

<sup>15</sup> [宋]苏辙，《黄州快哉亭记》。

无法“快哉”；反之，当人的内心不被外物所牵挂，不因环境的挫折而伤了自己的本性，那无论身处何地就都能够感到快乐。换句话说，苏辙将“自得”、“坦然”和“快哉”视为因果关系，只有“其中”自得，才能处事坦然，然后达到“快哉”。

<sup>16</sup>在苏轼的〈水调歌头〉中正恰恰说的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而“浩然”就出于《孟子·公孙丑》。<sup>17</sup>孟子还说：“自得之则居之安”，因此其中的自得，便是快哉的基础。<sup>18</sup>这里的“物”指的便是“自”之外的事物，他并非否定“物”的存在与其所能带来的快乐，否则上文就不会认同“快哉亭”因外部环境所形成的“快哉”。但对其而言，更重要的是“其中”不被物所蒙蔽，就如同他在〈超然台赋〉序中所言：“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翫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sup>19</sup>

苏辙以张梦得“不以谪为患”，反而能够建亭取乐一事来证明自己论点之可靠，表明这种自得其乐的“快哉”并非泛谈，而是确有其实；又举例各种文人骚客因自身处境和情绪而把连山古木等视为悲伤之地，反而不能体会此等胜景之美好作为反证，就加强了论述的力度。毕竟自然的客观事物并不会真的带有情绪，不过是看的人将自己的情感带入了进去。就如同苏辙本人因着自我调适的成公，能够不受到贬谪的打击，反倒能够体会生活中的乐趣，从而借“快哉亭”写下一番道理。

---

<sup>16</sup> 郭英德，〈“快哉”源于“自得”——读苏辙《黄州快哉亭记》随感〉，页 125。

<sup>17</sup> 杨伯峻译注，〈孟子·公孙丑上〉，页 62。

<sup>18</sup> 杨伯峻译注，〈孟子·离娄下〉，《孟子译注》，页 189。

<sup>19</sup> [宋]苏辙著，〈超然台赋〉。

## 第二节 “快哉”与筠州文化

元丰三年，苏辙来到了筠州。筠州辖高安、上高和宜丰三县，府治则设立在高安。此地乃一座山城，依山傍水，与齐州有湖水和泉水不同，这里有一江水（蜀水，又称锦江或筠水）横贯州境，将县城划分为二。<sup>20</sup>这点从苏辙笔下“江上孤城面面山，居人也自不曾闲”、“府门摧落涨江深”、“一看长江白练微”<sup>21</sup>和“城上青鬣四山合，门前白练长江泻”<sup>22</sup>便不难看出。对于筠州的环境，苏辙在〈筠州圣祖殿记〉就有很清楚的记载：“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复江，鱼鸟之乡。俗野不文，吏亦怠荒。”<sup>23</sup>

此时苏辙的公务便是每日过河到南城商业贸易中心去卖盐酒和收税，是为看似简单实则繁琐的工作。<sup>24</sup>在他的〈东轩记〉里便能看到他每日“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到了傍晚又要渡河回家，往往一到家便“昏然就睡”。<sup>25</sup>说到这东轩，还是因为苏辙一到筠州，便遇上江水泛滥，直叫盐酒税官舍被摧毁，苏辙及其妻小只能借居部使者府暂居，于是到了年末便修建东轩以作居所。<sup>26</sup>对比于此前的齐州，是实际意义上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公务繁忙使苏辙没有多少时间休息，这也让他多有牢骚，像〈雨中宿酒务〉更是调侃自己“早岁谬知儒术贵，安眠近喜壮心

<sup>20</sup> 曾枣庄，《苏辙评传》，页 148。

<sup>21</sup> 此四句出自[宋]苏辙著，〈再和十首〉，《苏辙集（第二册）》，页 195。

<sup>22</sup> 此二句出自[宋]苏辙著，〈次子瞻夜字韵作中秋对月二篇〉其一，《苏辙集（第一册）》，页 186。

<sup>23</sup> 豫章乃郡名，相当于如今江西。[宋]苏辙著，〈筠州圣祖殿记〉，《苏辙集（第二册）》，页 401。

<sup>24</sup> 戴佳臻，《苏辙的筠州岁月》（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页 19。

<sup>25</sup> [宋]苏辙著，〈东轩记〉，《苏辙集（第二册）》，页 405。

<sup>26</sup> 曾枣庄《苏辙评传》，页 149。



降”。<sup>27</sup>要知道他少有肺病，且不胜酒力，但如今却需要日日处理酒务，着实是“一醉仍坎坷”。<sup>28</sup>如此处境，或也是促使他更进一步采纳道释思想的缘由之一。

另一个原因则跟筠水浩瀚有关，苏辙〈秋雨〉写“云气山川满，江流日夜深”，这恰恰也与快哉亭依江所建的特征有所相似，故我们不难将〈黄州快哉亭记〉中有关江水的生动描写与之作联系。正因着他见识过江水的奔放，与苏轼虽身处异处，却能感同身受。同时，筠州是一个易涝易旱的地方，当地农作常颗粒无收，饥荒又会引起瘟疫，幸得苏辙从兄长那里学来了用圣散子作药，才救了许多人性命。<sup>29</sup>面对自然的浩大和生死的祸患，个人的性命显得如此渺小。在他的〈吴氏浩然堂记〉里说到：“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临乎生死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这正是他想要的处事态度，而张梦得因不患得患失所以无所不快也正是同样的道理。<sup>30</sup>苏辙并没有摒弃“超然”的哲理，反而在此基础上从虚无的淡然，寻求一种超脱以外的“快”，一种更为愉适的自处之道，显得更为洒脱。

筠州的和尚道士、佛寺道观很多，是佛道流传甚广之地，就连妇孺都喜穿道袍。至于苏辙，他自小多病，方才四十二岁便“视听衰耗”，于是便透过学习道士的“吐故纳新”作为养生之数，又向佛僧学取应对患难的忘忧心态。<sup>31</sup>在这里，他的儒释道交融思想也得到了拓展和稳固。他在筠州结识的僧人可考的便有近二十人，如同乡圣寿寺长老聪禅师、道全禅师和石台长老等；而可考的道士则有六七

---

<sup>27</sup> [宋]苏辙著，〈雨中宿酒务〉，《苏辙集（第一册）》，页 192。

<sup>28</sup> [宋]苏辙著，〈饮酒过量肺疾复作〉，《苏辙集（第一册）》，页 193。

<sup>29</sup> 戴佳臻，《苏辙的筠州岁月》，页 26。

<sup>30</sup> [宋]苏辙著，〈吴氏浩然堂记〉，《苏辙集（第二册）》，页 408。

<sup>31</sup> [宋]苏辙著，〈筠州圣寿院法堂记〉，《苏辙集（第二册）》，页 401。

人，如方子明和陈璞。<sup>32</sup>在这两种“消极”的思想带动下，他对于官场不再执着，甚至将应试而读书称为“俗学消磨意自清”，因为一旦进入官场，其中的争斗终将往昔的努力和风采付之一炬，所要面对的都是“臃腥”这类的同僚。<sup>33</sup>于是乎，苏辙既然看透了仕途的虚实，但现实却不允许辞官，一来需要养家糊口，二来又是戴罪之身，就更要从思想上去调适，去寻找“快”的出口。

---

<sup>32</sup> 曾枣庄，《苏辙评传》，页 161-162。

<sup>33</sup> [宋]苏辙著，〈次韵王适留别〉；〈和王适寒夜读书〉，《苏辙集（第一册）》，页 244；237。

## 第四章 “超然”与“快哉”的创作关联

苏氏兄弟的性格实际上相差很大，这点从两人的名字便可看出些许门道来。<sup>1</sup>在苏洵的〈名二子说〉一文提到他为两个儿子的命名：“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辙乎，吾知免矣”<sup>2</sup>，简单概括了苏轼放荡不羁、苏辙深沉不露的特点。在〈桂瑞堂暇录〉文亦载：“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sup>3</sup>苏辙的稳妥是自小养成，而苏轼的外向和洒脱也是与生俱来的。在他前往黄州的路上就曾告诉苏辙“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又说“便为齐安民”。<sup>4</sup>但由于没有俸禄，又要养家糊口，这并不容易做到，可他却依然在生活上找到快乐，而非为处境所困，故能说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这一番打趣，尽显乐观姿态；<sup>5</sup>反之，苏辙显得更为内敛，性格的不同使得他们哪怕思想相似，在文风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曾戏称“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并认为苏辙虽然文采不及兄长，但其作品内容的深度使他成为独具一格的大家。<sup>6</sup>

---

<sup>1</sup>前人系其写作时间为庆历七年（1047）。也就是说，两兄弟的名、字都是父亲在他们十来岁时才取的，这时候两人的性格特点已然有所凸显。（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页48。）

<sup>2</sup> [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名二子说〉，《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415。

<sup>3</sup> [n.d]佚名，〈瑞桂堂暇录〉，[明]陶宗仪编，陶珽重辑，《说郛》（中国：未知出版社，顺治3年，1646），卷29，页4。

<sup>4</sup> [宋]苏轼，〈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四》，页2115。

<sup>5</sup> [宋]苏轼，〈答秦太虚书七首〉其四，《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八》，页5755。

<sup>6</sup> “从各自的天赋来看，威廉詹姆斯（指苏轼）似乎该写小说，亨利詹姆斯（指苏辙）该写心理学和哲学的论文。然而威廉詹姆斯在枯燥的心理学和哲学教本中注入风采和幽默，亨利詹姆斯在小说领

## 第一节 苏辙的“超然”与“快哉”思想

苏辙 19 岁时第一次应试就中第，后因为母守丧加之争议答卷一事，一开始并未受到重用，而在苏辙写下“超然”时虽然尚未发生危及性命的巨变，但其实仕途生涯开始走下坡。他纵然在变法中熙宁变法中并非主导，但他因政见不同而自请外任的举动无疑已经将他划分成了反对派，从而受到政敌的打压。在这种不得志的情况下，苏辙不免需要自我开导，加上儒家、道家思想对他的自小渗透以及后来释家思想的介入，便使得他对于外物的执着变低。

他认为“夫君子之立言，非义苟显其理”<sup>7</sup>，是从受体的角度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命题，而他的“道”，是一种融合了儒释道之道，即有儒道的中庸又有道佛的客观。<sup>8</sup>因此“超然”便是苏辙对“物”的放下，让他转而注重本心，主张由心出发，透过心境的转变，就能使外物的干扰不再。

“乌台诗案”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而他能在此之后有如此乐观旷达的思想，实属不易，虽然这也曾确切使他的心境动摇。写〈超然台赋〉时，他认同了兄轼的“超然”心态，由借机抒发自己的思想，故以此为台命名；而在刚刚被贬筠州之际，他的心态却曾出现过一些变化。在他的〈东轩记〉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初到筠州，因着终日繁忙不得休息而“哑然自笑”。<sup>9</sup>其中，他以“桎梏之害”形容自己的处境，行文中也能看到他的哀叹。但我们却也不能因此就抨击他思想善变，毕竟兄长已自

---

域中注入人性思想和观察的结实内容。”[林语堂著，宋碧云译，《苏东坡传》（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页 176。]

<sup>7</sup> [宋]苏辙著，〈刘恺丁鸿孰贤论〉，《苏辙集（第四册）》，页 1339。

<sup>8</sup> 周楚汉，《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成都：巴蜀书社，2004），页 235。

<sup>9</sup> [宋]苏辙著，〈东轩记〉，《苏辙集（第二册）》，页 405-406。

请外任，却依旧被害入狱，自己也跟着被贬这等大事，心态上一时有所受挫也是难免的。不过，对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苏辙虽写“然而非所敢望也”即是表示“不敢”而非“不想”。<sup>10</sup>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他仍然对于“自得其乐”以及“超然”的内核是有所思考的，因而能够回到“善处乎祸福之间也”<sup>11</sup>。对此，张伯行亦认同，即提出“观此记有厌动求静之意。”<sup>12</sup>既然如此。在这之后他逐渐坦然而作〈黄州快哉亭记〉，便是水道沟成的事了，当然这与其受到苏轼超然的心态所影响不无关系。

在写“快哉”时，那种淡然沉稳的超然多了一层江水的快意，显得更为飘逸豁达，而张伯行就称苏辙的“快哉”有“潇洒闲放之致。”<sup>13</sup>无独有偶，吴楚材、吴调侯亦认为此文“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都忘。”<sup>14</sup>

“超然”和“快哉”之于苏辙看似是两个全然不同的名词，但所要体现的内核却是相同的，两者所强调的都是内心的重要性。而内心便是苏辙不断在调适以应对生活挫折的重要手段，他并非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先有了感悟，由透过笔和纸展露出来。甚至，往深一层去思考，这个时候的苏辙写“快哉”，究竟是否需要借着“快哉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先前说过，他甚至没有亲眼看过“快哉亭”的模样，却能以此作为文章思想的载物。换言之，他并非是借着亭或台才能悟出“快哉”的道理，而是本身有了快哉的思想，能够在不快哉的处境下自得其乐，方才透过这篇文章的表露出来。即是说，这也是他自我调适，已达到“快”的途径。

---

<sup>10</sup> [宋]苏辙著，〈东轩记〉，《苏辙集（第二册）》，页405-406

<sup>11</sup> [宋]苏洵著，〈名二子说〉，《嘉祐集笺注》，页415。

<sup>12</sup> [清]张伯行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214。

<sup>13</sup> [清]张伯行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页216。

<sup>14</sup>

## 第二节 引苏轼两者思想作比较

苏氏兄弟两人的思想粗看似乎“无不相同”，但世间上又怎么会有完全相同的人？或许我们可以以“同而不同”来概括他们。先说“超然”，与苏辙意图安慰的心态不同，苏轼的“超然”是从一而终的。他不需要所谓的调适，而是从一开始便以超越现实为指归，主立足于现实，并从现实生活的细节中领悟其超越性的意义。参透融合老庄出世哲学思想是苏轼超然世界观的主要来源，他继承了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的事物对立矛盾意识。

〈超然台记〉以“乐”为主线，所以说“凡物皆有所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就无往而不乐。于石校注“苏轼之乐，决非狂肆，游戏人生；亦非隐怠、颓放、疏懒。安愚顺性耳。”<sup>15</sup>确实，苏轼仅顺着本性中的洒脱，不拘泥于物，但对于自己的职责，他仍旧非常用心，并非怠惰狂妄。《庄子·秋水》有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而苏轼的“乐”便是由这道家万物齐一的思想转化而来。<sup>16</sup>因着苏轼对好与坏的同时接受，无论是酒糟还是薄酒，皆可醉；野果或瓜菜，都可饱腹，就不再忧虑于是否身处劣势，也因着本身的“超然”，他才能时刻感到“乐”。

他刚到密州时，面对的是“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sup>17</sup>。在这种情况下，“人固疑余之不乐也”<sup>18</sup>是正常的。但修建台时，他不

<sup>15</sup> [清]沈德潜选评，于石校注，《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下册）》（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页711。

<sup>16</sup> [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页577，583。

<sup>17</sup> [宋]苏轼著，〈超然台记〉。

<sup>18</sup> 同上。

仅体态丰润，甚至头发也由白变黑了。苏轼所认为的“超然”，是心态上的“游于外物”，而并非一定要归隐田野间。人和物是无法相互摆脱的，但当“物”涉及个人的荣辱及得失时，人们会将物欲名利当成人生追求，这将让自己局限在物之中，招来灾祸。正是因为只有摆脱物欲和个人的利害，以淡然超然的态度去感受自然并领会“桑麻之野的醇厚”及“风物之美”，才能“无往而不乐”<sup>19</sup>，而苏轼正是先有这超然的心态，因此他在“超然台”上所见的便是一片安稳快活的景象。故此，张孝先曰：“游物之外则虽遇皆安。世之胶胶扰扰、患得患失以终其身者，岂足以知公之胸次乎？”而苏轼说官吏百姓“亦安予之拙也”<sup>20</sup>，这里有自谦之意，近似于陶渊明所说“守拙归田园”<sup>21</sup>，并未表示自己真的拙笨无能，而是有着不愿与世俗合流的信心。

苏轼的“超然”心态在〈宝绘堂记〉中也有所展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sup>22</sup>“寓意”指的是一种审美态度，而“留意”则是一种功利的态度。<sup>23</sup>倘若过度沉溺于物，那么即使是“微物”也将成为隐患，而“尤物”更不足以成“乐”，例如喜爱书画，所以将情感寄寓其中，但不能过度沉迷，如此哪怕被他人夺去也不感到痛惜。换言之，他从超功利的精神境界出发，认为人各有所求，欲望是无穷尽的，那么眼前所见的任何事物都难以“皆有可乐”<sup>24</sup>。他以旷达超然

---

<sup>19</sup> 同上。

<sup>20</sup>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文集校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页 1105。

<sup>21</sup> [晋]陶潜著、杨勇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 56。

<sup>22</sup> [宋]苏轼著，〈宝绘堂记〉，《苏轼全集校注·文集二》，页 1122。

<sup>23</sup> 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页 658。

<sup>24</sup> [宋]苏轼著，〈超然台记〉。

的思想来看待外物，即美丑、善恶无不相同，只要以淡然的心态看待外物，那么即使仕途不顺，就也都不足挂齿。

苏轼旷达的基础在于随缘，“缘”在儒家就是“天”，在道家就是“道”，在佛教就是“因”，也就是人与自然的运作和存在规律。一言蔽之，即顺其自然，顺应规律。<sup>25</sup>就像苏轼自己所说的“万事如花不可期”<sup>26</sup>，自然便是可遇不可求。

至于“快哉”，苏辙的“快哉”是自适其乐从而达到自得其乐的“快哉”，而苏轼的心态相较于处在调适过程的苏辙，则更为“统一”。他在被贬黄州的第三年作了〈水调歌头〉<sup>27</sup>，文中亦出现了“快哉”二字，即他为张梦得所建之亭命名一事，但对于“快哉”，他有着自己的理解。因此，在描写“快哉”时，苏轼与苏辙都以宋玉作为典故，但二人在这典故上都有自己一番见解。

宋玉所谓风的气势与周遭的环境有关，而苏辙却认为外部快乐的先决条件在于内心，只要内心坦然，就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干扰了自己的本心，同时也能够在任何的处境下感到快乐。至于，苏轼则直接对宋玉所描述的“快”提出辩驳，指出风没有雌雄之分，所谓的“雄风”和“雌风”都是经过人用主观感受区别了客观事物，而宋玉不断强调“风”这外物的变化如何牵动人的“其中”，却忽略了人需要去除外物的干扰才能到达自主发展。苏轼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强调只要心中有“气”，就能在面对风浪侵袭时，顺其自然，享受“千里快哉风”<sup>28</sup>。《庄子·知北游》提及“气”乃“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sup>29</sup>，即人的生命由气组成，而苏轼

---

<sup>25</sup> 张海鸥，〈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页 209。

<sup>26</sup> [宋]苏轼著，〈次韵前篇〉，《苏轼全文校注·诗集》，页 2154。

<sup>27</sup> [宋]苏轼著，〈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苏轼全集校注·词集一》，页 431。

<sup>28</sup> [宋]苏轼著，〈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苏轼全集校注·词集一》，页 431。

<sup>29</sup> [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页 739。



则以“气”作为不为物累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物”的精神超越。<sup>30</sup>兄弟二人皆是以不为外物所累作为主旨，但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苏轼表现的更为超脱。

---

<sup>30</sup> 江梅玲，〈《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一词中的“老翁形象”——兼谈苏轼的“天籁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7期，页11。

## 结语

宋人以“人”作为记体散文的着力点，更多将个人的主观意识和自我感受投入其中，往往虚实参错，以动态描述取代正面描写，使之不为“物”所役，真正达到“物为我用”的层次。<sup>1</sup>这点在苏辙的文章中也有显著的表明，他对于外物的客观和动态记述，更多是为了后文的论述做铺垫。他的〈黄州快哉亭记〉不仅提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更带出“由外及内”和“由内至外”两种情形不一致的“快”，进而点出具有强烈主观感受的“无所不快”来。

在质朴的山湖之城齐州，苏辙笔下的“超然”同样恬淡静态，而在江水滔天的筠州，他又能将原有的思想进一步提升，加入“快”意的元素，而不背离超然于物的核心。要知道，古人常以台和亭作为游玩的歇脚处，但苏轼和苏辙却能够超越这种表层的游乐，以“亭”和“台”发挥自己的思想。两者皆有泰然处世之意，都强调了精神内核不受到外在环境的波及，即是老庄思想的放逸之处，但他们在老庄思想的基础上又各自诠释了自己的见解，其中这与他们的性格有关，对于“快哉”，比起苏轼的浩瀚奔腾，苏辙表现的较为沉静内敛，他们二人在历经乌台诗案的前后，在不同的时期下他们自己的思想仍没有改变，但二人之间对彼此思想的定义也仍有不同。苏辙是无论处在顺境或逆境中只要心中舒适，那么到任何地方都会快乐，而苏轼则是对外物的寡淡追求，就算处在困难境况下，仍可以超然于物外。

---

<sup>1</sup> 杨庆存，《宋代文学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页28。

无可否认，“超然”与“快哉”思想的萌芽之于苏辙是基于现实的打击，他在文章中也不免对于生活的牢骚，但我们不能因着这种“矛盾”便全盘否认他对于两者思想的采纳和论述，且研究古人思想的魅力之处便也在于其复杂性。更何况两者相较之下并无高低之分，苏轼一贯超然潇洒，而苏辙则是透过精神上的沉淀去升华，最终两者皆达到“快哉”和“自得”的境界，是以“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sup>2</sup>只是对于旁人而言，苏轼的“超然”和“快哉”终是高不可及的，反之苏辙正因着有调适的过程，反而为我们来到了学习的可能性，也更具有操作性。

---

<sup>2</sup> [宋]秦观撰，〈答傅彬老简〉，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页981。

## 参考文献

### 专书

1. 陈耀南,《古文今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2. 陈正雄,《苏辙学术思想述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3. 崔际银,《唐宋八大家新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4. 戴佳臻,《苏辙的筠州岁月》,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5. 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6.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 韩兆琦等,《唐宋八大家命篇赏析》,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9. 孔凡礼,《三苏年谱》(全四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10. 孔凡礼,《宋代文史论丛》,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11. 李回(分卷)主编,《唐宋八大家广选·新注·集评(苏辙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12. 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13. 林语堂著,宋碧云译,《苏东坡传》,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14. 刘松涛,吕晴飞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15. 饶学刚,《苏东坡在黄州》,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
16.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7. 杨庆存,《宋代文学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8. 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9. 曾枣庄,《苏辙评传》,台北市: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
20. 周楚汉,《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成都:巴蜀书社,2004。
21. 朱刚著,王水照主编,《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2.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

### 专书(古籍)

1. [楚]宋玉著,吴广平编辑,《宋玉集》,长沙:岳麓书社,2001。
2.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简体字本二十四史: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
4. [晋]陶潜著、杨勇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 [宋]苏轼著,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全二十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6. [宋]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7. [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栾城集》(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 [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9. [元]脱脱等撰，《宋史》（全四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
11. [清]沈德潜选评，于石校注，《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全二册），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2. [清]张伯行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专章

1. [宋]孔平仲著，〈孔氏谈苑·苏轼以吟诗下吏〉，新文丰出版公司编，《丛书集成新编（第八十六册）》，页 633-648。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2. [宋]秦观撰，〈答傅彬老简〉，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页 981-9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 [宋]孙汝听编撰，〈苏颍滨年表〉，王水照点校，《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页 73-104。北京：中华书局，2015。
4. [n. d]佚名，〈瑞桂堂暇录〉，[明]陶宗仪编，陶珽重辑，《说郛》卷 29，页 1-9。中国：未知出版社，顺治 3 年，1646。
5. 刘乃昌，〈简评苏辙的文学成就〉，《情缘理趣展妙姿——两宋文学探胜》，页 239-245。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6. 刘学著，刘扬忠、王兆鹏主编，〈2006-2007 年宋代文学研究论著的统计分析〉，《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2007）》，页 1-24。武汉：武汉出版社，2009。
7. 何伍修，〈擒住题面，畅加洗发——苏辙《黄州快哉亭记》赏析〉，《古典散文名作赏析》页 218-224。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8. 郑和平著，〈苏轼与密州文化〉，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页 594-611。济南：齐鲁书社，1995。

## 期刊论文

1. 郭英德，〈“快哉”源于“自得”——读苏辙《黄州快哉亭记》随感〉，《文史知识》2021 年第 2 期，页 121-128。
2. 江梅玲，〈《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一词中的“老翁形象”——兼谈苏轼的“天籁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 年第 7 期，页 8-12。
3. 乐牛，〈苏辙《超然台赋》赏析〉，《名作赏析》1989 年第 3 期，页 53-55。
4. 李冬梅，〈苏辙研究综述〉，《许昌师专学报》2002 年第 3 期，页 111-114。
5. 李天保、蒯琼，〈苏辙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深圳社会科学》2023 年第 4 期，页 131-138。
6. 刘乃昌，〈苏辙的齐鲁情结〉，《东岳论丛》2001 年第 5 期，页 112-113。
7. 吕武志、陈凤秋，〈从《文心雕龙》“六观”看苏辙的记体散文〉，《静宜中文学报》2012 年第 2 其，页 1-29。

8. 乔云峰，〈论苏辙与密州〉，《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五期，页 6-13。
9. 司聃，〈简论道教对苏辙的影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页 14-18。
10. 蒯琼，〈苏辙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及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 年第 11 期，页 31-33。